

论日本儒家政治文化的发展与变异

郭定平

内容提要 在长期的中日文化交流中,中国的儒家政治文化很早就传播到日本,并对日本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而复杂的影响。儒家政治文化在日本得到广泛传播并产生重大影响的过程中,与日本历史文化传统相适应、与日本社会政治需要相结合,逐渐发生一些重要的转化与变异,并形成日本特色。这种儒家政治文化的日本化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在江户时期儒家政治文化就开始与国家神道、武士道、新法家相结合,明治维新以后更是被用来美化和强化天皇统治。日本儒家政治文化虽然来源于中国经典的儒家文化,但在本质上它是一种日本化了的政治文化。

关键词 儒家文化 政治文化 文化发展 日本

郭定平,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200433

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近邻,自古以来就与中国有频繁而密切的文化交流,因此中国的儒家政治文化很早就传播到日本,并对日本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而复杂的影响。但是,如何分析和评价日本儒家政治文化的发展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不少人认为儒家政治文化时至今日仍然对日本具有广泛影响,甚至有人强调中日儒家文化的共同价值可以为中日关系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为东亚区域合作提供强大的支持。本文旨在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日本儒家政治文化的发展与变异,力图说明儒家政治文化在日本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日本化了,形成了变异的日本儒家政治文化,以期加深对日本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的认识。

一、儒家政治文化在日本的传入与演化

儒家文化强调治国安邦,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文化。在儒家文化于公元6世纪初传入日本之后,儒家的一些基本政治观念和政治主张就引起日本统治者的极大关注,并迅速成为他们施政的依据。从公元6世纪末期到7世纪中期大化革新前后,日本儒家政治文化出现了第一次发展高潮,并深刻地影响了日本后来政治发展的基本走向。

公元593年,时年20岁的厩户皇子被立为女帝推古天皇的太子,史称圣德太子。圣德太子被天皇

任命为摄政,负责推行各项政治改革措施。圣德太子不仅具有卓越的政治才能,而且精研儒学,颇有造诣,开始摄政后便以儒家政治文化为指导思想进行政治改革,力图以中国为榜样建立一个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进入7世纪之后,圣德太子首先制定了“冠位十二阶”,这些冠位既无规定名额,也无实际职权,只是授予贵族的荣爵,按照才能和功绩授予个人,不得世袭。因此,冠位制度的制定与实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氏姓门阀势力的影响,起到了选拔人才的作用,为以后官僚体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十二冠位的名称就是以儒家伦理中的德目来命名的,即在儒家“仁、礼、信、义、智”五常之上冠以“德”,再各分大小,从而组成“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礼、小礼、大信、小信、大义、小义、大智、小智”共十二位阶,又以紫、青、赤、黄、白、黑各色按浓淡分别为冠,显示他们在朝廷的地位。

公元604年,圣德太子领导制定了“十七条宪法”。当然,那时的宪法根本就不是后来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而只是一种规范和引导官民行为的道德训诫条文。十七条宪法的内容很多源自《礼记》、《论语》、《尚书》、《汉书》、《孝经》、《周礼》、《文选》、《左传》、《孟子》、《老子》、《毛诗》、《史记》、《孙子》等中国典籍,反映了儒、法、道等诸子百家及佛教思想,其中以儒家思想为主。儒家的德政、礼治、“三纲”、“五常”在十七条宪法中均有明显体现^[1]。例如,第一条“以和为贵,上下和睦”,就出自《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左传·成公十六年》“上下和睦”,《孝经》“民用和睦,上下无怨”。第四条“以礼为本。其治民之本,要在乎礼。上不礼而下非齐。下无礼以必有罪”,就出自《礼记·哀公问》“为政以礼。礼,其政之本与”,《论语·子路篇第十三》“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论语·宪问篇第十四》“上好礼,则民易使也。”第六条“无忠于君,无仁于民,是大乱之本也”,就出自《礼记·礼运》“君仁臣忠”。第十二条“国非二君。民无两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就出自《诗经·小雅·北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孟子·万章句上》“天无二日,民无二王”。

在十七条宪法条文中,除了上述具有明确的中国典籍出处之外,其它如第十一条“明察功过,赏罚必当”,第十四条“不得圣贤,何以治国?”第十五条“上下和谐”,第十七条“事不可独断,必与众宜论”等也是儒家政治文化的基本主张,相似或相近的表述在儒家文献中不胜枚举。由此可见,圣德太子不仅自己精通儒家政治文化,也试图通过引进儒家政治文化观念来恢复日本政治秩序和建立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只是由于圣德太子本人也推崇并沉溺于佛教,一些以儒家文化为指导思想的改革措施并未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儒家政治文化的影响仅局限于贵族上层的有限范围。

虽然圣德太子的改革本身未能取得预期的成效,但是在他摄政时期恢复和加强了与中国的交流,为此后的大化革新准备了条件。公元645年6月14日,当时主张革新的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联合发动宫廷政变,迫使皇极天皇让位,同母弟孝德天皇继位,以中大兄为皇太子,中臣镰足为内臣,任命高向玄理和僧文为国博士即国家的政治顾问,组建了革新派政权。6月19日召群臣盟誓,仿照中国定年号为大化,以公元645年为大化元年,其后新政权推行的改革就称为大化革新(日语称“大化改新”)。在新政权中被任命为国博士的高向玄理和僧文就是圣德太子于公元608年派到中国的留学生,僧文在中国留学24年,于公元633年回日本,高向玄理在中国学习与生活长达32年,于公元640年回国。他们在华留学几十年,经历了隋亡唐兴的历史巨变和见证了唐初的繁荣发达,回国之后积极传播中国儒家政治文化思想,大力推介唐代的政治制度,成为大化革新的精神导师。

大化二年(公元646年),孝德天皇发布《改新之诏》,并陆续推行了一系列革新措施。其主要内容虽然在具体形式和某些细节方面有一定的创新,但是总的来看明显受到中国儒家政治文化和唐朝的政治制度的影响。大化革新的各项举措不断推出,持续长达半世纪之久,直至公元701年(大宝元年)

[1]姜林祥编著:《儒学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67-68页。

《大宝律令》的制定才告一段落。《大宝律令》将大化革新的成果固定下来,于702年正式实施。该律令共计律六卷,令十一卷,律是对各种犯罪和刑罚的规定,令是对官制、兵制、税制等的规定,仿照唐朝的政治、法律制度,并结合日本的实际情况而制定,为日本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制度奠定了基础。根据《大宝律令》的官制规定,中央设二官八省一台五卫府。二官即神祇官、太政官,前者掌管国家祭祀,后者领导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太政官下设中务省、式部省、治部省、民部省、兵部省、刑部省、大藏省、宫内省。台即弹正台,是肃正风俗和弹劾官吏不法行为的机构。五卫府即卫门府、左右卫士府、左右兵卫府,是负责宫廷警卫的军事机构。各机关原则上由长官、次官、判官、主典四等官和附属他们的一些下属官吏组成。比较日本大化革新后的中央机构与唐朝政治制度,中国唐朝省部制的影响不容忽视^[1]。

这里值得特别强调的是太政大臣一职。太政大臣是最高国家机关太政官(相当于现在的内阁)的长官,太政官内设左弁官、右弁官和少纳言三局,左右弁官分管八省。太政大臣定员一人,由亲王一品或诸王、诸臣中之正从一位者充任,位居三公之首,辅佐天皇,总理国政。但是太政大臣为非常设官职,太政官的所有政务实际上由左大臣统领,当左大臣出缺或因故无法履行职责时由右大臣统领一切政务。太政大臣与左大臣、右大臣合成三公。《大宝律令》的职员令规定,太政大臣的人选必须是天皇的师范,“四海之仪形”的有德之人,“经邦论道,调和阴阳”,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则宁可空缺,因此太政大臣也被称为“则阙之官”。很显然,这是重视道德教化的儒家思想的体现,是反映儒家德治思想的一种特殊制度安排^[2]。太政大臣犹如中国古代的太师一样,非道德功勋崇高者不居其位,宁缺毋滥。

日本在大化革新中全面引进中国的文化和制度,儒家政治文化得到广泛传播,并对日本政治体制和政治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使得日本政治在随后的千余年中差不多永久地打上了儒家的烙印。宋朝的程朱理学产生之后很快就传入日本,以朱熹为代表的新儒学在日本称为朱子学。到南北朝时期,朱子学开始受到官方重视并广泛传播。义堂周信(1325-1388)看重《四书》的价值,把儒学作为政道的一种参考,1379年应足利义满之请赴京都,先后任建仁寺、南禅寺住持,并指导义满修习禅和宋学,在给义满讲解《大学》、《中庸》、《论语》等儒家典籍时强调,治理国家的人一定要明德、正心、修身为先^[3]。随着足利义满时期中日经济文化交流的开展,朱子学也得到推广和宣扬,并逐渐在日本全国取得了优势地位。

二、江户时期儒家政治文化的日本化

在公元1600年的关原之战中德川家康获胜并夺取全国霸权,随后便于1603年迫使皇室封他为右大臣和征夷大将军,在江户(今天的东京)开设幕府,从此开始了将近三百年的德川幕府统治。德川家康既是一位精明的政治统帅,也是一名热衷于中国文化的大学者。他曾经邀请藤原惺窝讲授《贞观政要》和《汉书》;出版《诗经》、《易经》等中国经典;聘请林罗山为儒学顾问,学习和研究儒家政治文化。

藤原惺窝(1561-1619)早年削发为僧,学禅习儒,随后出于对社会政治现实的关心决定脱禅入儒,精研儒学并成为日本朱子学的开山鼻祖。藤原惺窝的高足之一就是林罗山(1583-1657),他18岁读《朱子集注》为之倾倒,遂立志于朱子学研究,对朱子学的官学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林罗山先后服务于德川家康、秀忠、家光、家纲四代将军,进讲朱子学,撰写重要文书、法令,编辑、校订史籍等,当时幕府的重要文书和各种法度草案几乎皆经其手。1630年幕府赐以上野忍冈以建家塾。自林罗山起,林家子孙世代担任幕府儒官,掌管文教大权。第二代林鹤峰(1618-1680)将林家学塾改称弘文院。第三

[1]朝河贯一:《大化改新》(日文版),〔东京〕柏书房2006年版,第202-203页。

[2]王仲涛、汤重南著《日本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7页。

[3]吴廷璆主编:《日本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9页。

代林凤冈(1644-1732)于1691年担任大学头,并由林家世袭。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在汤岛建孔庙,将林家私塾弘文院从忍冈移入其中,奠定林家朱子学的官学基础。1790年(宽政二年)幕府实行“宽政异学之禁”,进一步明确林家朱子学为幕府正统思想。1797年弘文院升格为昌平坂学问所,成为幕府直属的学校,负责教育15岁以下幕臣^[1]。幕末时期,诸藩人才汇集于此,十分兴隆。

儒家政治文化在德川幕府统治时期的得势一方面是由于统治者的实际需要。德川家康平定天下之后就曾经提出,全以马上而得天下,从今以后则不必以马上而治天下,“若能常遵信圣贤之道,大凡欲治天下者,行人之为人之道,此外不应有道,自治世之初,屡屡尽心于文道矣。”^[2]特别是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战乱之后,德川统治者亟需巩固自己的政权,恢复社会政治秩序,重建道德基础,而原来曾经在这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佛教已经走向衰落,不堪为用。另一方面,林家朱子学继承儒家政治文化传统,强调君臣之道和上下等级身份关系,同时也提倡朱子学所主张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政治理想,这些基本思想和理论主张恰好迎合了德川幕府统治的需要,于是顺理成章地被德川统治者所采纳而成为幕府体制的理论支柱。

德治仁政是儒家政治文化的重要内涵,德川历代统治者不仅学习和研究儒家思想,而且知行合一,努力践行儒家仁政爱民的各项主张,为德川政权的长期稳定和发展提供了基本保障。公元1680年,德川纲吉继任为第五代将军。据说德川纲吉特别清正廉洁和崇拜儒家思想,在其统治期间推行了许多仁政爱民措施,其初政“天和之治”就重在端正幕府纲纪,赏罚严明。由于在第四代将军德川家纲统治时期矿山收入减少,商品经济发达,官府奢靡之风蔓延,财政状况逐渐恶化,德川纲吉继任之后努力加强和改善幕府直辖领的统治状况,于1680年8月5日命令老中堀田正俊专管农民问题,8月16日又在正俊之下安排了勘定头4名、京都町奉行2名,由此7人商议并实施直辖领行政事务。幕府将军亲自召集老中堀田正俊和勘定头,训令道:“听说近年来幕领农民很贫困,必须实行仁政,以不致于农民衰亡”。随后又对主管幕府领地的诸代官(相当于中国的县令)命令道:“由于历年来代官的处置不当,令直辖领的民众陷入贫困,已经有所耳闻,今后必须更加忠于职守、勤政爱民。”^[3]对于那些腐败无能的代官则进行严厉处罚。在纲吉执政的29年间,共有51名代官遭到死刑或者免职的处罚,其中30名是从天和元年(1680)到元禄三年(1690)纲吉初政的10年间受到处罚的。考虑到元禄15年幕府的代官人数一共只有60名,可见纲吉整肃代官之严厉。

为了贯彻将军的指令,幕府在1680年8月以堀田正俊的名义发布了对代官的七项训令,其中第一条就规定,民为国之本,代官要能察民之辛苦,传达他们有无饥寒之忧愁的情况。两年之后幕府在全国建起了“高札(告示)”,其中颇具代表性的就是“忠孝札”七条,第一条就要求厉行忠孝,夫妇兄弟诸亲戚和睦相处,体恤家仆,若有不忠不孝者必定重罪。代官训令和忠孝札均为七条,各包括道德性训示和一些具体禁令,一个是宣扬为政者对待人民的道德,一个是倡导人民在社会生活中应当遵守的道德。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儒学就是在这种方面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手段加入到幕府政治中来的。这就要求为政者方面要以儒教的精神施政,也要求人民遵从儒学宣扬的社会道德。”^[4]在这一时期,儒家政治文化作为官方正统意识形态不仅与政治结合紧密,而且对全国的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也很广泛和深入。

日本儒家政治文化在得到广泛传播并产生重大影响的过程中,与日本历史文化相适应、与日本社

[1]吴杰主编:《日本史辞典》,〔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05-506页。

[2]源了圆:《德川思想小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

[3]柏村哲博:《日本宽政期幕政改革和地方行政》,〔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10页。

[4]辻达也:《〈政谈〉的社会背景》,载获生徂徕著《政谈》,〔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6-280页。

会政治需要相结合,开始发生一些重要的转化,逐渐形成所谓日本特色。这种儒家文化的日本化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并且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思想家身上具体不同的特点。归纳起来,最为显著的日本化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儒家政治文化与国家神道的结合。藤原惺窝就主张神儒合一,以儒学解释神道,他说:“日本之神道,亦以正我心,怜万民,施慈悲为奥秘。尧舜之道亦以此为奥秘也。唐土曰儒道,日本曰神道,名变而心一也。”^[1]林罗山继承藤原的思想,主张神儒调和,成为日本神儒合一的先驱。日本朱子学的后期著名代表人物山崎闇斋一方面极力推崇朱子学,一切以朱子学之是非为是非,另一方面则是致力于朱子学与神道的结合与折中。他说:“嘉谓盖明德也,心也,知也,一理也;而明德者心之表德,知则心之妙用也。其为物,方寸灵台,神明之舍,指脏而言。其人之神明,心之神明,就德而言。其脏之中虚而灵,即是神明而德之妙也。”^[2]这是就虚灵不昧来说心、说知、说神,为神儒合一论开辟道路。更有甚者,山崎闇斋将神道思想与神国思想相联系,提倡忠君报国。

第二,儒家政治文化与武士道的结合。日本历史上很早就形成了武士阶层以及相关的伦理道德准则,到战国时期诸藩武士大展身手,以忠勇为核心的武士道也发展到极致状态。但是,在德川幕府体制建立之后,随着新的政治机构的建立与和平社会的到来,武士的生活状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作为战士为主君效忠的武士现在开始作为政治家或行政官僚发挥他们的作用。因此,就必须建立不同于战国时期武士的全新的理想武士形象。于是,一些江户时代的儒学者试图用儒家文化改造武士道。中江藤树就努力通过儒教来塑造理想的武士形象,他认为武士的“士道”就是儒道,因此他就试图用儒教来充实和改造武士道思想。中江的弟子熊泽蕃山更是提出,只要通过儒教的礼乐文章来锤炼仁爱无欲的武士气质,这些人就能成为理想的士君子。真正推动儒家政治文化与武士道相结合并具有广泛影响的思想家是山鹿素行,他认为,不从事生产活动的武士的职责就在于实现人伦之道,在道德方面成为万民的典范,并为此提出了道德修养的具体要求和操作规程。例如,他特别重视威仪的地位和作用,要求武士在正威仪方面做到慎视听、慎言语、慎容貌之动,他甚至规定了衣食住方面的理性威仪形式^[3]。正如黄秉泰所说:“山鹿素行的基本问题与阐明献身于适应其地位的伦理职责的武士之原则或道相关。因此,对山鹿素行来说,儒学存在的主要理由是它对阐明武士阶级的伦理准则的有用性,即武士阶级在社会相互作用的公共领域里弘扬道时的伦理准则。”^[4]

第三,儒家政治文化与新法家的结合。朱子学在日本广泛传播的同时,也受到了一些批评。荻生徂徕(1666-1728)早年信奉朱子学,但是后来就脱离宋儒,提倡古学,追寻先王之道。他认为宋学关于心法的讨论、围绕“理”进行的争论都是毫无实际用处的学问,于是推崇古学,认为先王之道是治国平天下之道,其具体内容就是礼乐刑政。与宋儒专事修身不同,荻生强调制度建设,认为即便幕府将军个人率先垂范,成为天下的楷模,但是如果制度建设不起来的话,依然无法解决当前面对的问题,更何况幕府将军还有换代问题。因此他提出要在职务高低、官员大小、俸禄多少、礼仪繁简等方面逐一立法^[5]。与此同时,他也十分重视录用贤才,并与制度建设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以达到治国平天下之目的。由于他试图通过复兴先王之道,强调儒学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性,从而实现对儒学政治文化的根本性重建,所以荻生徂徕在日本儒家政治文化史上首次提出了个人道德与政治决断的分离问题,主张把私限

[1]永田广志:《日本哲学思想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6页。

[2]朱谦之:《日本哲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2-53页。

[3]源了圆:《德川思想小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版,第68-69页。

[4]黄秉泰:《儒学与现代化——中韩日儒学比较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79页。

[5]荻生徂徕:《政谈》,〔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97页、第226-228页。

制在私的领域,反对以私论害公论。正如他自己所说:“若以私论害公论,此后天下之法无以立。”^[1]太宰春台是荻生徂徕的门生,在对朱子学心生疑窦之后,大胆引入法家思想,推动了儒家政治文化与新法家的进一步结合。太宰春台不仅认为法家思想是先王之道的重要内容,而且充分肯定法家思想在治国安邦中的实际意义。他说:“至于申不害、韩非之刑名法术,及诸子所论之道,皆夫有用者也。能用之,则皆良药也,未尝不能疗治国疾也。”^[2]春台对法家思想的重视和对法的作用的强调均远胜于他的老师荻生。这些对宋儒空谈误国的批判、对个人道德与政治领域的分离以及对法治在治国安邦中的作用的强调就为日本的近代思想的萌芽奠定了基础。

三、明治维新时期儒家政治文化的异化

日本儒家政治文化在幕府末期就出现了明显的衰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外来思想的传入,原来由幕府统治体制维持的儒家主流意识形态地位遭到挑战,各种新思潮不断涌现,儒家思想内部也不断分化。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荻生徂徕对宋儒乃至先秦儒家的批判。他不仅指斥朱子学是鼓吹仁义道德、天理人欲的“虚学”,甚至怀疑和挑战孔子的圣人地位,发展出了所谓“孔子圣人失格论”^[3]。荻生徂徕的思想和著作马上遭到了传统儒家学者的攻击和清算,并一度导致了政治上的迫害。在1790年的“宽政异学之禁”中,荻生徂徕的思想被斥为“异学”而遭封杀。尽管如此,江户时代后期日本思想界、学术界、文化界的新潮流在出现和涌动则是不争的事实。日本儒家政治文化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了一种从被动适应到主动转化的历史过程。

从18世纪20年代开始,日本幕府不再实行严厉的锁国政策,而是允许部分的西学进入,其中由荷兰语介绍到日本的兰学得到快速发展,日本人通过兰学开始接触和认识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西学中的理性精神与实证科学与传统的儒家思想形成鲜明的对照。在此过程中,一些人很自然地学习和追捧西学,而另一些人则反对洋学,努力维护儒学的正统地位,当然也有一些人试图将洋学与儒学结合起来,并进行一些调和。著名的儒家学家佐久间象山(1811-1864)就认为儒学和洋学各有所长,可以互相取长补短。一方面,他充分肯定儒学道德的纯洁性和优越性,视贵贱尊卑的社会等级为理所当然;另一方面,他也非常推崇西方科学的价值,强调宇宙间“理”的同一性和普遍性,以打破科学技术的国界限制,为摄取西方科学技术提供正当依据,认为西洋的“穷理”与儒学的“格物致知”一样,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佐久间象山进一步提出了“东洋道德、西洋艺术”(实指“西洋技术”)的思想,认为东西文化思想可以相互借鉴和补充,相得益彰^[4]。这种将东西文化思想结合起来的折中路线一方面避免了传统儒学家的攻击,另一方面为吸收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开辟了道路。但是,这种折中思想路线只不过是一种过渡,是一种暂时的思想潮流,随着日本的开国和“文明开化”运动的兴起,西洋思想和文化全面涌入日本,儒学就很快退居更加边缘的地位了。

在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过程中,日本“求知识于世界”,不仅有岩仓具视使节团等赴欧美各国考察学习,而且大量招聘欧美各国的专家到日本传道授业。与此同时,日本开始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引进西方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项制度。特别是明治政府于1872年颁布《学制》,学习西方教育制度,在日本全国分区设立大学、中学和小学,并在学习内容上广泛吸收西学,原有的教授儒学的学校大部分被废除,坚持学习儒学的人数急剧减少。于是,日本全社会崇洋之风盛行。一位历史学家在描述当时的情形时说:“把旧文化视为因循姑息、陈规陋习,对西方新文化怀着无上的尊敬和憧憬,

[1]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48-49页。

[2][3]韩东育:《日本近世新法家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63页,第47-50页。

[4]王家骅:《儒学和日本的近代化》,载吴廷璆主编《日本近代化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55-356页。

这成为风靡上下的时代思潮。”^[1]在明治维新开始后不久的1871年左右,在东京的知识分子中,国学家只有汉学家的十分之一,而汉学家只有洋学家的一半。学习和研究洋学的知识分子大量介绍和宣传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功利主义等西方思潮,尤其是边沁和密尔的功利主义思想影响最大。当时提倡洋学、鼓吹“文明开化”的新派学者于明治六年(1873年)组织成立了“明六社”,出版《明六杂志》,专门从事新思想的宣传和普及工作,其重要成员包括森有礼、西村茂树、津田真道、西周、加藤弘之、福泽谕吉、中村正直、箕作秋坪、箕作麟祥、杉亨二、神田孝平等。

其中,福泽谕吉在传播洋学、推动日本的文明开化方面影响和贡献最大。他的许多著作在当时均广泛发行和流传,特别是《劝学篇》从1872年的第一篇起,到1880年的短短八年之间发行总数约有七十万册。在《劝学篇》的第一篇,福泽谕吉开宗明义就提出:“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主张人人平等,并在此书各篇之中广泛阐发了平等、独立、自由、法治的启蒙思想^[2]。在1875年出版的《文明论概略》中,福泽谕吉明确主张文明有先进与落后之分,在当时的世界各国之中,“从总的情况看来,不能不说日本的文明落后于西洋”,因此,“如果想使本国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3]与此同时,他把日本的停滞和落后归咎于儒学,认为儒学思想因循守旧,专注人伦和治人之术,毫无用处,儒官卑屈下贱、趋炎附势、助长专制。他甚至对儒学进行了如下的极端攻击和辱骂:“汉儒的系统是从尧舜传到禹、汤、文、武、周公以至于孔子,孔子以后,圣人就断了种,不论在中国,或在日本,再没有出现过圣人。孟子以后,宋代的儒者和日本的硕学大儒,对后世可以自诩,但是对孔子以上的古圣人则一句话也不敢说,而只有叹息自己学圣人而不及圣人而已。所以儒教在后世愈传愈坏,逐渐降低了人的智德,恶人和愚者越来越多,一代又一代地相传到末世的今天,这样发展下去简直要变成禽兽世界。”^[4]在此大势之下,日本儒家政治文化的凄惨状况就不言而喻了。

随着日本的开国和大量引入西方文化与制度,一方面,整个日本社会崇洋之风盛行,一切以欧美为标准,不仅儒家文化传统被抛诸脑后,就是日本汉字书写也受到批判,甚至有人主张放弃日本文字,全部改用英文;另一方面,在此急剧变革时期社会问题大量涌现,特别是道德滑坡引起日本社会各界的反思和反省。1876年,西村茂树与阪谷素、丁野远影、植松直久、杉亨二等人一起创办了东京修身学会,后改为日本弘道会,致力于恢复和重建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日本道德传统,对近代日本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与此同时,另一个为儒家传统道德的复兴而奔走呼号的组织是斯文学会,该组织以不满于洋学充斥、洋风泛滥而倡导儒家传统文化为宗旨的思齐会为基础,在岩仓具视、股野琢、广濑广一、重野安绎、川田刚等人的支持与配合下于1880年成立,参加的会员达到一千五百余名,并得到明治天皇一千圆的赏赐,可谓盛极一时^[5]。

从思想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复兴传统儒家道德的保守主义思潮明显是对文明开化运动的一种反动。有意思的是,鼓吹文明开化的明六社成员西村茂树自己也意识到过分洋化的种种弊端,开始主张重建日本道德,并成为日本近代史上最有影响的道德学家。特别是他于1886年在东京帝国大学所做的演讲《日本道德论》成为影响日本思想文化发展的名作。在此演讲中,西村茂树认为,明治维新开始之后日本整个社会尽扫一切旧物,废黜了过去长期以来奉为道德标准的儒道,日本人失去了道德的根据,人心凝聚力变得松弛,国民道德渐渐显露颓废之兆,于是他主张以儒学、哲学(即“世教”)为主,兼容佛教、耶稣教(即“世外教”),重建日本道德价值和道德秩序。虽然西村主张博采众长,兼收并

[1]坂本太郎:《日本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00页。

[2]福泽谕吉:《劝学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页。

[3][4]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68页、第11页,第148-149页。

[5]高田真治:《日本儒学史》(日文版),〔东京〕地人书馆1941年版,第263-264页。

蓄,但是在他的日本道德论中,儒学的重要地位和独特贡献是显而易见的,正如他自己所说:“在儒学方面,国中还有不少老成的宿儒,承担着教导之任者不乏其人。况且忠孝之教在护万世一系之天位、正君臣之分、美国民之风俗方面没有能与其相比者。”^[1]在此西村茂树明显主张借助儒家政治文化来美化和强化天皇统治。

在对大肆引进欧美文化进行反省并倡导复兴儒家道德的朝野各界人士之中,明治天皇和天皇的侍讲元田永孚就扮演了非常特殊的角色,产生了重大影响,进一步推动了日本儒家政治文化的异化。1879年8月明治政府将天皇巡视地方学校时的“圣旨”传达给重臣和文教当局,其内容就是要求日本教育的根本精神以讲授仁义忠孝的道德为第一,指斥最近的弊害主要在于竞相崇尚洋风。根据天皇“圣旨”,文部省于同年9月颁布新的教育政策,认为现行的小学教科书中四十处不合适的内容,勒令禁止使用,其中就包括福泽谕吉、箕作麟祥、加藤弘之、中村正直和津田真道等被视为文明开化的洋学者的著书^[2]。侍讲元田永孚坚持主张通过天皇对教育的干预来恢复儒家道德。元田是明治时期著名的儒学家,1871年入宫内省,专任侍读,后任侍讲,居天皇左右讲授儒学达20年。他为了对抗洋学的大量侵入,主张向国民灌输儒家思想,并以天皇“圣旨”的名义,拟制和发布了《教学大旨》和《幼学纲要》,提出以儒家的仁义忠孝之道德作为教育的基础。特别重要的是,元田永孚参与起草了《教育敕语》,并由天皇于1890年发布。《教育敕语》由天皇亲手交给首相,表面这是一部超越普通法令的绝对法规,具有至高无上的圣神地位。《教育敕语》首先指出:“朕唯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厥济斯美。此乃我国体之精华,教育之渊源亦实存于此。”其次列举“孝父母、友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等儒家道德,指出必须“重国宪、遵国法,一旦有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皇运”^[3]。《教育敕语》颁布之后直至日本在二战中战败的1945年为止,一直作为日本全国各级学校乃至全国国民生活的最高准则被强制贯彻执行。《教育敕语》将儒家的传统道德与近代的日本天皇制国家主义相结合,使儒家政治文化出现了严重的异化,最终沦为日本加强天皇统治和推行军国主义对外扩张的工具。

由此可见,近代以来日本儒家政治文化在实现日本化的同时,更出现了严重的异化,一方面在国内政治中儒家文化被用来强化封建道德和对天皇的效忠,巩固法西斯统治,另一方面在日本推行对外侵略扩张政策过程中日本被鼓吹为儒家文化的“正统”,迫使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各个国家和地区效忠天皇,接受日本的侵略和殖民统治。因此,日本儒家政治文化虽然在历史来自中国,但是在长期的历史演化中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日本化了,并在近代出现了严重的异化。这样,日本儒家政治文化尽管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存在若干相同相似之处,但在本质上它是一种日本文化,对中国儒家文化而言是一种异质的存在。唯有如此,才能端正并加深对日本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的认识。

[责任编辑:史拴拴]

[1]西村茂树:《日本道德论》,载卞崇道、王青主编《明治哲学与文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104页。

[2]远山茂树:《日本近现代史》(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6页。

[3]王振锁、徐万胜:《日本近现代政治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第70页。